



东亚学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历史学研究所
日本·亚洲研究中心

主编 盛邦和 孟凡东 李平民

亚洲与东方学概论

本卷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执行主编 韩炯 孟凡东 汪堂峰
执行副主编 张一平 山磊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日本·亚洲研究中心

主编 盛邦和 孟凡东 李平民

上海财经大学“十一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平台建设项目
上海财经大学精品课程项目

亚洲与东方学概论

本卷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执行主编 韩炯 孟凡东 汪堂峰
执行副主编 张一平 山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与东方学概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编.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 8

(东亚学研究)

ISBN 978-7-5642-0936-0/F · 0936

I. ①亚… II. ①上… III. ①亚洲-研究 ②东方学-研究
IV. ①K93 ②K1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9885 号

- 责任编辑 李嘉毅
- 书籍设计 钱宇辰
- 责任校对 王从远
胡 芸

YAZHOU YU DONGFANGXUE GAILUN

亚洲与东方学概论

主 编 盛邦和 孟凡东 李平民
本卷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执行主编 韩 炯 孟凡东 汪堂峰
执行副主编 张一平 山 磊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竟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10mm×960mm 1/16 16.75 印张 328 千字

定价: 34.00 元

序：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论纲

盛邦和

历史在进步，亚洲文明也在进步。我们一起讨论什么是文明，世界上不同的文明是怎样形成的，也一起回答“何谓亚洲”，即亚洲的特质是什么，由此探寻亚洲文明进化的规律与路径。亚洲有原型亚洲与更新亚洲的区别，更新的亚洲就是太平洋亚洲。亚洲文明的进步是必然的，将从原型亚洲文明走向太平洋亚洲文明。中国在亚洲，中国文明的过往蕴含于原型亚洲文明的历史之中，中国文明的愿景寄望于太平洋亚洲文明的开幕。^①

一、文明与生态环境

（一）文明的定义和内涵

“文明”这个概念出自中国古籍，如《易经·乾卦》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恩格斯给文明作了如下的定义：“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②文明是社会的品质，显示民族、国家、地区、社会的进步状态；文明是历史的体现，表明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动态过程。文明与生态环境发生基本联系，由此可以说明世界上不同类型及不同阶段文明形成的基础原因。文明是基于生态环境，综合生产方式、社会构造及文化特点的体系构造。

（1）生态环境体系。大陆、海洋、温暖、寒冷成为环境体系的四大基本要素。

（2）生产体系。人类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和环境产生两种基本对应关系，即“人—土地”的对应关系和“人—海洋”的对应关系。不同的对应关系形成三种生产体系：第一，亚洲大陆型农业思潮体系；第二，亚洲大陆型游牧生产体系；第三，欧洲海洋型工商生产体系。

^① 本文1990年初稿于日本东京大学，2003年载于学林出版社所刊论文集《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题为《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论纲》。本次发表作了较大修改，增入近年所发表论文的内容，并注明出处。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6页。



(3)社会体系。人口、土地、市场、家庭、集团、制度等是人类社会体系的基本要素。

(4)文化体系。宗教、文学、艺术、哲学、伦理等是文化体系的基本要素。

(二)生态环境体系对文明的影响

孟德斯鸠(1689~1755年)力证自然地理对人性、民族性和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作用,指出不同的气候、土壤、地理条件是形成民族习俗、素质的物质原因。伏尔泰(1694~1778年)著有《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以下简称《风俗论》),成为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路易十四时代》的姐妹篇。该书阐述了人类各种文明的起源和它们的特点,并解说之所以产生不同特点的原因在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气候相异。

黑格尔(1770~1831年)著《历史哲学》,设专章《历史的地理基础》强调:想要去了解文明的来源,就要去发现培育文明的襁褓与摇篮——地理环境。黑格尔说:“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基础。”他又说:“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计得过高或者太低”,这是因为“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①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和其他条件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文明系统显示其层级构造,生态自然—生产—社会—文化是它的四个基本层级。构造的上层是文化,中层是社会与生产,而生态自然则是文明层级构造的基础底层,指的是“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③

(三)生态环境体系的四个要素及四个环境区

生态环境体系具有四个要素,即大陆、海洋、温暖和寒冷。地球据此四个要素分为四个环境区:第一环境区——温暖的大陆区(亚洲);第二环境区——寒冷的海洋区(欧洲);第三环境区——温暖的海洋区(如日本);第四环境区——寒冷的大陆区(如俄罗斯)。

第一环境区(亚洲)和第二环境区(欧洲)是世界主要环境区,是世界文明的主要诞生地。第一环境区具有“大陆”和“温暖”两个突出的环境要素,由此创造出亚洲文明。第二环境区具有“海洋”和“寒冷”两个突出的环境要素,由此形成欧洲文明。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③ 同上,第67页;盛邦和:《生态自然与社会历史的辩证叙说》,《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9月。



寒冷的大陆区一方面具有欧洲文明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具有亚洲文明的性质，可谓“半欧洲”（俄罗斯及东欧）。

温暖的海洋区因受海洋环境的刺激，工商业有所发展，“半亚洲”（以日本为典型）的特点很鲜明。

二、文明的进步

（一）丛林时代

孔多塞在他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这样描述人类的原始状态：“我们观察到的最初的人类文明状态乃是一种人数很少的社会状态，他们靠着渔猎为生，只懂得制造他们的武器和某些生活用具以及构筑或挖掘居处的粗糙技术；但已经有了语言可以交流他们的需要，有了少数一些道德观念，在那里他们找到了行为的共同规则；他们生活在家庭中，遵守某些起着法律作用的普遍习俗；甚至还有了一种粗糙形态的政府。”人类生活方式的本质是他们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的基础则是他们的环境对应方式。这个时代人类的对应环境是丛林，人们依据“丛林”而生，从事采集与狩猎活动，生产方式极其低下。

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大猛兽中间还能生存。他们以果实、坚果、根作为食物；音节清晰的语言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有史时期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已经没有一个是在处在这种原始状态的了，虽然这一状态大概延续了好几千年之久。^①

这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是采集与狩猎。人们一开始采集果实、坚果和根作为食物，后来发明了火，就开始捕捉鱼类。火可以使鱼类食品更鲜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以后，人们就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自从发明了弓箭，“打猎也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之一”。^②

这个时代社会的基本成员是“丛林人”，这个社会也就是“丛林人社会”。从社会进化的观点来看，人起源于“猿”，故而“猿群”的社会组成方式应该是人类社会组成方式的雏形，而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即为离开“猿群社会”特质的远近程度。如果说“猿群社会”的权力方式是一种原始的暴力，那么蒙昧时代的社会权力也必然是离原始暴力不远的强制的权力。这个时代的社会也就是“强制社会”。从精神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18页。

^② 同上。



上说,这个时代人类尚未完全脱离“兽性”,蒙昧未开,其“人性”尚处在早期发育的过程中。这个时代人类的“自由精神”还在黑暗中摸索。这个时代也就是汤因比所说的“黑暗时代”。

(二) 土地时代

这个时代人类的环境对应方式发生了变化,走出丛林,从依据“丛林”而生改变为依据“土地”而生;社会的基本成员是农民,因此是“农民社会”;基本生产方式是农业,是为“农业社会”。这个时代又是恩格斯所说的“野蛮时代”,“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①人们从事耕作与畜牧,排斥工商,自给自足成为基本生产方式。从政治意义上说,这个时代的社会基层组织是血缘家族,而国家与民族是血缘家族的同质放大。社会权力是基于血缘大家族制的国家强权,因此成为“专制社会”,与丛林中的“强制社会”具有类同的本质,都以原始暴力作为权力的凭证。从精神意义上说,自由精神还在窒息之中,因此也称“黑暗的中世纪”。这个时代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一种是西方——希腊罗马的方式,即古代的方式;另一种是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两种方式都是农业生产方式,本质相同,只是后者具有明显的东方公有制的特点,没有完成从原始公有向封建私有的发育性转化。后者社会的血缘纽带更强劲,血缘组织——农村公社的形骸更坚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成为组成亚洲社会的基础“原子”。农村公社的存在,使得专制体制在亚洲得到分外明显的展现,此所谓“东方专制主义”。

(三) 市场时代

文明在进步,人类的环境对应方式再次发生变化,不再依靠土地,转而依凭市场而生活,从“古代生产方式”演进到“现代生产方式”。恩格斯继承与发展亚当·斯密的思想,强调社会分工最终催生市场制度:

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在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在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是从事商品交换的阶级——商人。^②

市场时代的生产方式是市场运作的方式、资本增值的方式和商品交换的方式,社会基本成员从农民转化为市民。如果说中世纪社会是“农民基质社会”,那么市场社会就是“市民基质社会”。从“丛林人”到“农民”,再到“市民”是人类成长的三个阶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② 同上,第161~162页。



“丛林人”是胎婴期的人类，“农民”是幼童期的人类，而“市民”则是人类的“成年人”。胎婴期的人类产生强制的社会，幼童期的人类产生专制的社会。人一旦长大，社会组成形式也随之变化。

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是欧洲的革命因素。

它在中世纪的封建组织内已经赢得了公认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同封建制度的继续存在已经不相容了，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覆灭。^①

恩格斯所说的中等阶级就是市民阶级，而由市民阶级组成的社会也就是市民社会。市民阶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将封建生产关系视为禁锢其发展的铁笼。市民阶级在其发育、成长与壮大的过程中，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扫荡殆尽，将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一举摧毁，将主张“回归”的农业文化力加扬弃，最终将前现代的土地社会、农民社会、专制社会转变为市场社会、市民社会与公共社会。市场社会、市民社会、公共社会这几个概念带有内在的相关性。市场社会（物的社会）的发育引起市民社会（人的社会）的发育，市场与市民的发育程度是现代化发展的两个基础标志。进而言之，亚洲落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最先目标即为市场与市民的发育。因有了这两个基础“发育”，方可衍生出高次元政治与文化的发育。

“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②。每个国家与民族都要从“野蛮”演进到“文明”，实现这样的演进是文明的进步，不去实现且阻止这样的进步则是历史的停滞与倒退。“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③，这样一个民族假如说还是在自己的逻辑轨迹中运行，那么现代化促使这个民族必须放弃原有落后的生产方式，实现由孤立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让每个民族的单独活动都归入到世界性的共同活动中去。^④

三、现代化的“反思”

（一）日本亚洲主义

19世纪、20世纪之交，日本出现过亚洲主义思潮。对于这个思潮，学术界又冠以“大亚细亚主义”的名称。日本亚洲主义最初的意思是指在亚洲（主要是东亚儒教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④ 同上，第67页。



共同文化的背景下,以日本为主导,施行中日、亚洲连携,共同抗击欧美世界列强的侵略。与近现代世界上出现的许多其他思潮相似,日本的亚洲主义有其内在的逻辑发展过程: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亚洲主义在中国曾产生过影响,梁启超有“亚粹”思想、章太炎有“亚洲和亲主义”、孙中山有“大亚洲主义”等,某种程度上是对日本亚洲主义的回应。这些理论的提出,一方面肯定日本亚洲主义积极面的思想意义,主张弘扬亚洲传统、推动地区联合,同时也对此思潮中的负面意义表示警惕。无论是日本的亚洲主义还是中国的“大亚洲主义”,其实质都是现代中日亚洲理论的一种表现。如何看亚洲,如何看亚洲文化,如何看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与日本以至与亚洲的关系,这些都是亚洲主义曾经接触过的问题。^①

(二)俄国欧亚主义

俄国欧亚主义 20 世纪初盛行于俄罗斯移民知识分子群体,萨维茨基、特鲁别茨科伊、卡尔萨文和维尔纳茨基等是这个“主义”的代表。

萨维茨基沿用麦金德的理论,强调俄国是处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中央国家”,可以说全部理论都建筑在这个思想基础之上。蒙古人 13 世纪后的入侵与统治为俄罗斯注入了充分的“草原帝国”的政治血液。萨维茨基不讳言这段历史,提出独到的史观:“没有鞑靼统治时期,就没有俄罗斯”,俄罗斯不应该将蒙古对俄罗斯的统一看作作是“鞑靼的桎梏”。^②

欧亚主义理论建立在“俄罗斯—东方,欧洲—西方”这个思想规则之上。没有这个规则,他们的理论就失去鲜活的价值。西方与东方,一切都处在两元对立的状态之中,秉持这种“对立”,不得丝毫松懈,是斯拉夫主义与欧亚主义的共同原则。

欧亚主义主张维护俄国历史上的三大支柱——东正教、集权、村社。欧亚主义的宗教基础是东正教。公元 988 年,俄罗斯人接受了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这是一个崇尚集权模式、政教合一的宗教。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俄罗斯以成为东正教的直系继承者而自傲。^③

欧亚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必须在俄国建立强大的“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

① 盛邦和:《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

② 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0 页。

③ 同上。



家”，而且“它的领导者是独裁者”。^①

俄国农村历来盛行村社的形式，土地平分、分配平均、集体生产是村社的基本原则，村社生产的极端低效率性换得社会的高度稳定性，村社政治的高度组织化让其成为俄国统治的社会基盘。村社主义成为民粹主义的精神支柱，也成为欧亚主义确定发展方针的国情依据。^②

（三）俄国村社主义

在俄国，直到 20 世纪初还普遍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村社。村社是古代原始公社的次生与再次生形态，是被马克思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停滞、落后的社会形态。土地的原始公有、土地平分、共同耕种、大家长制、农民束缚于土地，如此等等，形成村社的基本特点，也形成俄国社会国情与文化国情的基础。19 世纪中叶，俄国走上了资本市场的道路，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掀起“村社社会主义”的旗帜，阐扬村社的“原始公有”与“绝对平分”原则，决意阻止资本在俄国的“扩张”，跨越“资本”的“峡谷”，直达“社会主义”。远古农业公社在亚洲（包括俄国）的长期滞存是亚洲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因此亚洲现代化的本意即为克服滞存性，走出旧亚洲。俄国村社社会主义将远古指为“现代”，将蒙昧指为“文明”，将落后指为“先进”，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特性指为“社会主义”理念，由此成为旧社会的顽守主义与旧文化的回归主义。^③

（四）中国井田主义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不少关于井田制的记载，是儒家对中国远古田制的猜测与追想，体现了经世济民的制度设想、安邦治国的社会理想，综合而成了以原始公有、土地平分、人身束缚、宗法维护为特征的井田精神。井田精神在中国相传久远，成为中国经济史的重要思想线索。井田精神乃是多元的思想组合，既炫耀“大同理想”的历史亮点，又折射“乌有之乡”的空想色彩，其合理元素经扬弃、更新可为有益的精神遗产，其保守内容则决定了它在文明坐标上的低端位置，成为中国历史长期停滞的精神原因，更成为当下妨碍改革与发展的阻滞主义根源。^④

（五）中国反思主义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反思主义思潮，省视“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反对“商业精神”，主张中国“长为农国”，宣传“大同”理想。如同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以欧

^① 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9～151 页。

^② 盛邦和：《生态文化学说与中国的文化期许——中日俄比较的视野》，《河北学刊》2009 年 9 月。

^③ 盛邦和：《俄国“村社社会主义”叙论》，《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 年 10 月。

^④ 盛邦和：《井田精神与中国经济史的思想线索》，《福建论坛》2008 年 12 月。



文、傅立叶、圣西门为代表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和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名为“民粹主义”的俄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以孔、孟为代表的，体现“大同”理想的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体现为以“安贫乐道”论、“不患寡而患不均”论、“奇技淫巧”论为标识的非物质论、非科技论与非国富论；以“农本”论、“抑商”论为表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维护论与市场经济反对论；以“大同”主义、“礼运”精神为号召的中国古典“公有”论。中国 20 世纪上半叶的反思主义乃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接续与现代展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既为“宝藏”，又为“山岳”。“宝藏”存在于“山岳”，经由对传统的珍视、扬弃与弘扬，对“山岳”的攀越、开采与利用，“山岳”由是为“宝藏”；反之，任“山岳”为原生态的存在，其必为中国现代发展的“精神大山”。^①

四、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

(一)“人—土地”对应关系及其自然法则

在亚洲大陆区，人和环境的“对应关系”是“人—土地”。人依赖土地，通过耕作享用农产品，或通过畜牧享用牧产品以维持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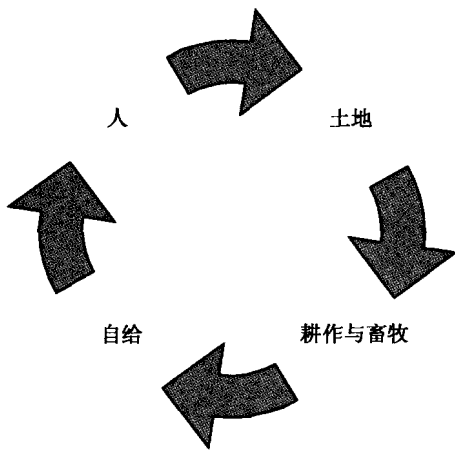


图 0-1 “人—土地”的对应关系

人一旦与土地结上关系，即形成“人—土地”自然法则。这个法则具有以下特点：人口无节制增加，土地无节制倾泻。

(1) 人口无节制增加。农业劳动的集约性、季节性与单纯性激发社会对农业人口

^① 盛邦和：《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现代阐发——上世纪上半叶中国反思主义叙论》，《福建论坛》2007 年 12 月。



的刚性需求。前近代农业社会中,人口的增加绝无计划性,总以“不可逆”的方式持续激增。

(2)土地无节制倾泻。土地不会长期均等地配置在农民手中,总以“水往低处流”的形式快速“倾泻”到少数人手中,即所谓“土地兼并”。

人口无节制增加与土地无节制倾泻的并存、矛盾与冲突,是“人一土地”自然法则的基本含义。如此法则的存在,成为亚洲文明体系的基本成因。

(二)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

“人一土地”自然法则的存在形成了亚洲文明体系圈。这个体系圈以如下的顺序作循环往复地运动:

(1)人口无节制增加而土地不增,且土地肥力日益衰减,由此,人口超负荷,“人一土地”的均衡性被破坏。

(2)土地无节制倾泻兼并将众多的人口赶离土地,产生流民。

(3)流民组合,形成威胁既成秩序的“脱秩序势力”与“暴力源”。

(4)“脱秩序势力”增大,“暴力源”引爆,流民暴动。流民暴动与市民革命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前者非新生产力产物,而为古老农业生产关系的特殊接续与修复方法。

(5)流民暴动的直接结果:超负荷人口因战争而消除。

(6)“土地倾泻”的主体——豪农与商人被消灭与冲击。

(7)流民企求的土地“均分”在战争中被强制执行。

(8)产生“好皇帝”。

(9)新政府以威权之手,再次推行土地“均分”。

(10)人与土地的矛盾缓和,社会由乱而治。

(11)封建威权强健,出现“贞观之治”式的治理局面。

(12)经过一段历史时期后,威权衰变,政权腐败。

(13)“人一土地”自然法则再起作用。

(14)新一轮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再行启动。

(15)社会再次动乱。

五、原型亚洲文明的特征

(一)平均—专制—“石女”—停滞

何以产生专制主义?“水利说”认为亚洲大陆为利用河流灌溉,必须有一个专制政府。英国麦金德的“大陆中枢说”称俄罗斯大部分国土在亚洲腹心地区,为防止周边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入侵,需创立军事集权与专制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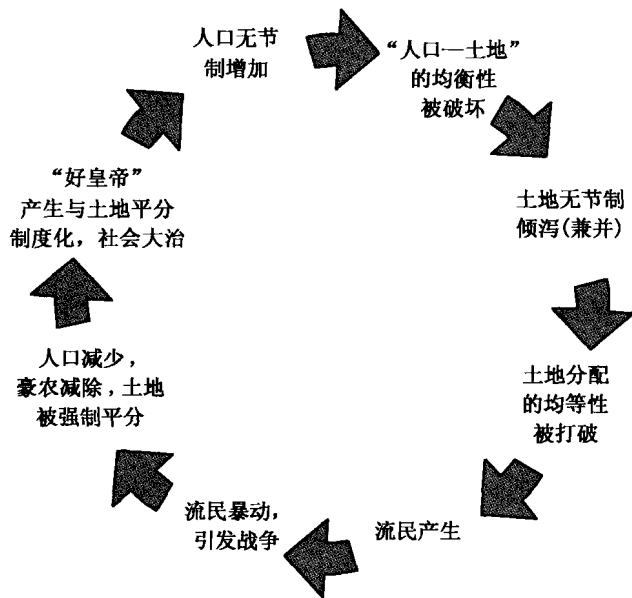


图 0—2 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

在中国古代，“平均—专制”的密切关系是封建专制主义成立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社会动乱的初因是流民剧增与农民（流民）暴动。流民（失去土地的农民）是社会的动荡震源与暴力引媒，而究其起源，则在于农业社会的最大分配不公即土地分配不均，而使土地分配恢复平均的方式只有两个：流民暴动与皇权专制。

土地不会自动回到农民手中，除农民暴力之外，皇权对土地分配的强制干预实为妙法。中国人口众多，土地缺少，当众多的“饥儿”围绕着一块有限的“蛋糕”（土地）时，争夺、暴力与动乱在所难免。“强壮的儿童”与“弱小的儿童”在“蛋糕争夺”中，后者总处于弱势，由此阶级产生，不平滋长，动乱益烈。这样，社会就呼唤出一个“超然的强者”与看得见的“第三只手”，用超乎强者与弱者之外的威权力量来安排“儿童”的秩序，决定“蛋糕”（土地）的均分。这第三种力量，无疑就是皇权与专制。

如福泽谕吉所说：“一国实行专制政治不一定是专制君主和官员的过错，实际上国民……自己招致了这一不幸的政治。”专制主义和农民有很大关系，农民祈望土地的绝对平均，舍弃“平等”而换取“平均”，因此总是欢呼王权的复活与皇帝的再生。专制主义在农民的吁求中真理化、权威化与渗透化。皇帝崇拜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



强势思维。^①

为什么原型亚洲社会是“停滞社会”？为什么原型亚洲文明是“停滞文明”？原始人→农民→市民是人类成长的图解；丛林社会（自然社会）→土地社会（农业社会）→市场社会（工业社会）是社会演进的方程。亚洲历史上“重农抑商”，重视农业，抑制商业，打击商人，尤其是民间商人，且每次农民暴动都将商业与商人焚烧于战争烈火之中，亚洲由此成为无法正常“分娩”市民与市民社会的“石女”。社会进步由此受阻，文明进化由此停滞。

普列汉诺夫说：“中国和古代埃及经济发展的逻辑，并没有引起古代生产方式的产生”，“古代社会是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同样，东方社会制度产生以前的社会组织，也就是氏族社会组织。这两种经济构造的形式中，每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发展的结果，这生产力的发展，到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组织崩溃。”^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古代生产方式”即为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在东方的历史进程中，在氏族组织制度即原始公有制度理应消亡的时候，它没有出现应有的“崩溃”。当西方社会已经顺利向私有制转化的时候，东方却紧抱原始的“公有制”不放，而且这样的“公有制”还在此后极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其次生形态得以持续保持，而这也是东方社会无法自觉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③如韦伯所说：“人口与物质生活虽有高度的成长，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仍然保持完全静止的状态；经济领域虽存在极有利的条件，但就是不见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④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

1853年，马克思发表了《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提出“亚洲式的社会”的概念，用以区别西方社会。1857～1858年之间，马克思写了不少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马克思这个时期手稿的一部分。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⑤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种形式》一文及其他有关著作中的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如下几个特征：（1）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实行专制国家的土地国有制和公社的土地占有制；（2）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并成为社会生产

① 中国自秦汉以来为君主专制社会，钱穆却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并无所谓专制，唯蒙元、满清两个政权可作专制论。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页。

② 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36～37页。转引自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③ 盛邦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中州学刊》2006年4月。

④ 马克思·韦伯：《中国宗教》，新桥译丛1989年版，第11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



和生活的基本组织；(3)政治上实行的是专制主义政权体制。^①

1.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在亚细亚社会中,没有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这样的私有制只存在于欧洲。马克思常和恩格斯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当读到贝尔尼埃有关东方经济制度的论述时,他对恩格斯说:

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②

恩格斯同意这样的说法。他回信说: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与宗教史的基础。^③

这样的土地“公有制”甚至在近代的俄罗斯仍保存完好。马克思认为:

以游牧民族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还没有达到真正发展的起点),他们偶尔从事某种耕种。这样就有了土地所有制。它是公有的,这种形式按照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程度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这个例子。^④

2. 农村公社

在亚洲式的社会,尤其是印度,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组织,这就是农村公社,而“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同时,“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是远在游牧生活和农业生活形成以前时期的较古的公社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个“基础”,使印度社会长期“一无抵抗、二无变化”,亚洲式的农业经济方式持久延续。^⑤

这样的农村公社不仅印度有,在俄罗斯也普遍存在并顽强地显示着它的生命力。一个叫哈克斯特豪森的人 1845 年注意到俄罗斯“公社”。当他探知俄国社会中居然存在如此众多的农村公社,而且还都活生生地繁衍与发展着,感到十分惊讶,遂将其称作“奇妙的东西”。此后,他著述立说,出版了《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

① 吴泽:《东方经济社会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2 页;盛邦和:《吴泽与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 年 4 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8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25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4~45 页;盛邦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中州学刊》2006 年 3 月。

⑤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49 页。



农村设施的考察》一书，将他的“发现”公布于众。^①

事实上，在东方，从印度到俄罗斯斯拉夫民族，特别是在俄国本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俄罗斯”，次生形态的农村公社一直保存到 20 世纪。

在西欧，包括波兰和小俄罗斯在内，这种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消除了。相反，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状态。^②

3. 东方专制主义

“公社”是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细胞，它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洞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始“切片”。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数千年中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③

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一文中说：

这种国家政权的形式，也是由公社当时所采取的形式决定的。在有的地方，如在亚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罗斯人那里，当国家政权出现的时候，公社的耕地还是共同耕种的，或者只是在一定时间交给各个家庭使用，因而还没有产生土地所有制。在这样的地方，国家政体就以专制政体而出现。^④

马克思主义认为：

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公社形态占优势的地方，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⑤

在亚洲，“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水利”是浩繁而巨大的工程，“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结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⑥

（三）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

中国古代出现过原始公有制，即井田制。这个制度在春秋战国时，经“初税亩”及

① 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618 页；盛邦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中州学刊》2006 年 3 月。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97 页。

④ 同上，第 541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618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4 页，盛邦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中州学刊》2006 年 3 月。



“商鞅变法”等改革而趋于废除。井田制的废除使中国土地私有成为可能。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庄园经济成一时之盛。北魏至唐初均田制颁行,土地私有经济曲折生长。唐废“均田”之后,中国出现大地产庄园经济、地主租佃经济及小农自耕经济三种模式。至于明清,地主租佃制与小农自耕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体土地制度模式。历史说明,中国战国之前有过亚洲式公有制——井田制,以后则以地主租佃制、小农自耕制为标识。中国古代生产方式并非全然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说不典型。^①

(四)“根本的革命”与“双重的使命”

马克思认为,亚洲应有一场根本的革命。这是一场走出中世纪的革命,克服亚细亚生产方式落后因素的革命,赶紧从一种低端社会形态向高端社会形态转进的革命。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的最后发问道:“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场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又说: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英国在对印度进行残酷统治的同时,发生了帝国主义所没有预期到的历史效果,在促发地区“内部革命”方面,扮演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②这样的观点,早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显示端倪。《共产党宣言》从两个方面阐述这个问题。首先指出“东方的发现”促进了西方的发展。如果说美洲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那么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开拓、美洲的殖民化,则使西方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西方的发展固然起始于西方内部的“革命”,同时也缘起于东方的“发现”,如果没有东方的“发现”,西方的发展不会那么快。这就可以说,“发现”(侵略与掠夺)引动了“发展”(列强的崛起)。东方的牺牲换取了西方的发展,这是西方发展的历史逻辑。^③

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回过来说:东方一旦与西方接触,则客观上推动了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刺激了那里的封建社会“内部革命”因素的迅速发展。此后,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把这样的观点更加明确地显现出来。

当西方跨入现代文明的门槛时,蒸汽机已经成为其最主要的动力机器,资产阶级市场制度与宪政制度在这里形成并日趋成熟,被称作“资本主义精神”的新伦理也在

① 盛邦和:《中国土地权演化及地主租佃、小农自耕模式的形成》,《中州学刊》2009年1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